

古墨通論

曹錦炎 著

(修訂本)

古墨通論

曹錦炎 著

(修訂本)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古璽通論/曹錦炎著. —修訂本.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308-13267-1

I. ①古… II. ①曹… III. ①古印(考古)—研究—中國 IV. ①K877.6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01847號

古璽通論 (修訂本)

曹錦炎 著

責任編輯 殷 堯
責任校對 王榮鑫
封面設計 項夢怡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廣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16.25
字 數 215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308-13267-1
定 價 98.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中心聯繫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序一

坵、鈔等字，今天已經確知是璽的初文了。从土、从繁體爾的璽字，始見于秦統一後，有陳介祺舊藏“皇帝信璽”封泥爲證。陳氏《封泥考略》誤題“漢帝信璽封泥”，則是他未憶及《史記》有明文記載的緣故。

古鈔這門學問，從清朝季年到民國初年這一階段才逐步形成。趙之謙、黃士陵印譜中，還都錯認它是“秦印”。民國初，嶺南篆刻家李君尹桑愛好這派印章，專力摹擬，開風氣之先，對篆刻界有一定影響。他甚至自署書室曰鈔齋、曰秦齋，有印譜行世。我年輕時曾一度心向往之。實際上他所愛重者都是春秋戰國鈔，並非秦統一以後物。凡此皆是歷史的局限性，我們不好譏笑他們。不久，吳式芬《雙虞壺齋印譜》和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出來，嶄然列古鈔于卷首。後來商務印書館影印陳書，大量發行，從此天下皆知這類遺物是古璽，是先秦時代的作品，不再稱爲“秦鈔”。

古鈔之學，訴自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已在每字末列入古鈔文，羅君福頤繼起編著《古璽文字徵》專書，這門學問漸有專門研究。近年古文字學界有一批學者專攻“戰國文字”，古鈔便是主要材料之一。在過去吳、羅等人集錄單文的基礎上，多有新的釋讀和發揮。這門學問正在蓬勃發展著。我個人對此一直愛

好，祇是年來太老，孑然家居，孤陋寡聞，不能隨諸君子之後參與末議，添磚加瓦，引為憾事。同事曹錦炎兄年富力强，對此道研究有素，平日發表單篇有關論文不少，近頃更從事于綜合性、系統性的編述，寫出《古璽通論》上下編共十章，示我稿草。舉凡文字的審釋、形制的考述、年代的推斷、方國的隸屬，分門別類，參合衆說，提出己見，開卷釐然，真能全面說明問題，解決問題。

錦炎兄出于君省吾之門。歷年研究的成果，主要如考證出甲骨文中“伏”是北方風名，“食日”是時間名詞，皆已為甲骨學界所公認。傳世“岫嶼碑”，過去誤認為“禹碑”，他證以金文越器，釋出全文，考訂是越國鳥蟲書刻石，解決了幾百年的懸案。古鉢“牽”字，他曾寫出審釋專文，帶敘一系列从“牽”聲的字，獲得1988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這裡僅舉犖犖大者。以彼其才，加上不斷努力，前程未可限量。浙江為新派古文字學發祥地。早期首出是瑞安孫氏、上虞羅氏、海寧王氏，近年有唐君蘭、陳君夢家，接踵不絕。我于錦炎兄，正以羅、王、唐、陳期之。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沙孟海序于杭州西溪寓齋，年九十二。

序二

曹錦炎同志出自吉林大學于省吾先生門下，對古文字學有深湛研究，歷年曾發表許多論作。近日承他以新著《古璽通論》稿本見示，我反復披讀，殊感此書篇幅不大，然而取材闊博，立義深遠，富于創見，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不僅對古璽研究，而且在整個戰國文字的探討上是重要的建樹。

古璽即秦統一以前的官私璽印。如錦炎同志在本書中所述，清代中葉的印譜開始將古璽識別出來，專門收集古璽的譜錄則到晚清才有出現。吳大澂的《千鈔齋古鈔選》，是這種專書的濫觴。此後有不少專輯古璽的書，詳見橫田實《中國印譜解題》、季崇建《中國古代印譜八百年集成》（《中國文物世界》選載），而以羅福頤先生主編的《古璽彙編》為其巨擘。好多學者精研古璽，撰有論文，但作為專書來說，大都與秦以後古印合論，特以古璽為主題的罕見。陳邦福先生早年曾撰有《古璽發微》，也很簡短，且流傳不廣，連有的書目都未能收入。古璽的研究者、愛好者早就期待有一部綜述古璽知識，特別是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錦炎同志本書正滿足了這種要求。

古璽研究的新成果，以文字的釋讀最為突出。現已發現的古璽，絕大多數是戰國時期的。大家知道，戰國時“文字異形”，變化多端，在各種古文字中最難辨識。近些年戰國文字研究突飛

猛進，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已成為相當成熟的分支學科。在不少難識文字的釋讀中，古璽起了關鍵的作用。同時，研習戰國文字的學者也多以古璽作為着手處。其所以如此，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是，古璽在戰國文字各門類中發表較多，豐富多樣，又有便利的工具書，如與《古璽彙編》相配合的《古璽文編》；另一個原因是，古璽內容多為人名、地名、官名等項，易于同文獻及其他有關材料相對照。在《古璽通論》里可以看到大量利用古璽識讀戰國文字的例子，這裡無需例舉。

由于古璽涵有種種人名、地名、官名等等，從而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在田野考古工作時，墓葬內發現古璽，可借以考知墓主的身份、姓名之類事項，有時非常重要。一個例子是1978年河北石家莊小沿村發掘的漢初大墓，有黃腸題湊，其中所出戰國文字銅璽為人名“長耳”，“長”戰國時與“張”通，從而知道墓主是趙王張耳，這是現知最早的漢諸侯王墓，在考古學上頗有意義。

從古璽人名還可研究先秦姓氏名字。例如在私璽中有不少複姓，有些後世久已消失，但可與漢印互勘，對姓氏譜系的研究是有價值的。很希望有學者能就古璽的姓氏作進一步整理，根據出土地點或字體特徵區分國別，必將有所貢獻。

古璽地名尤有裨于古代歷史地理的探索。戰國時期列國地名紛繁，建置屢更，文獻材料又有限。雖有若干學者從事研究，如清代顧觀光的《七國地理考》，程恩澤、狄子奇的《國策地名考》等，仍存在不少疑難問題。從一些有關歷史地圖繪製中遇到的困難，即能窺見。古璽所見當時地名甚多，有一部分為文獻所未載，或據出土所在，或據璽本身形制、字體、格式的特點，或據後世地名推測，能夠考定其國別位置，這當然是很重要的。

古璽官名也十分豐富。戰國官制雖都源出周朝制度，但變化很多，特別是在郡縣制的形成過程間，出現新的職官。秦國的官制，則多為統一後的秦漢時代所沿襲。自明代董說《七國考》以來，研究戰國官制的學者代不乏人，唯限于材料，新獲不多。古

璽中的職官，有些爲文獻所無，彌足珍異。

以上所說的這些方面，從錦炎同志這部《古璽通論》都可找出許多例證。

對古璽的研究，自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其在美術史上的價值。篆刻是我國藝林的一朵奇葩，代有名家，而古璽實爲其最早的淵源。各種文字璽，有的古樸渾厚，有的奇逸峭拔，極富變化；至于肖形璽，更是小中見大，變幻無端，值得我們取法。玉質古璽鐫刻技法的精妙，每每令人嘆爲不可及。古璽的鈕制，不受成規約束，多種多樣，也極能引人興趣。這些在本書中均有論述。

總之，本書對古璽做了多角度的綜合考察，于概述已有研究成果之外，更廣開新的境界，使人讀來妙趣橫生。相信愛好文物考古、歷史文化以及傳統美術的讀者，都會從本書得到啓迪。

李學勤

一九九一年夏于北戴河

目 錄

序一	1
序二	3

上編 古璽與古璽文字

第一章 古璽的時代	1
第二章 古璽的認識與研究	23
第三章 古璽的形制、分類與使用	41
第四章 古璽文字的構形特色	71
第五章 古璽文字的地域特色	89

下編 官璽分國考述

第六章 楚	107
第七章 齊	145
第八章 燕	171
第九章 三晉	191
第十章 秦	217

後記	243
----------	-----

修訂後記	245
------------	-----

上編 古璽與古璽文字

第一章 古璽的時代

古璽印，是古代人們作為昭明信用的憑證，劉熙《釋名》說：“印，信也。”同時，它也是國家行政機構實行職權的工具。

在先秦時代，古璽印大都稱為“璽”。應劭《漢官儀》說：“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用之。”^①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嬴政兼并六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製定了一系列制度，才規定皇帝所用的印稱“璽”，一般只能稱“印”。衛宏《漢舊儀》曾指出：“秦以前民皆佩綬，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自秦以來^②，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雲夢秦簡中“印”、“璽”名稱並見，均指官吏或官署的印鑒，可證衛宏說不誤。漢代略有放寬，除皇帝外，皇后、諸侯王等最高級貴族所用的印也可稱“璽”，這已為出土或傳世漢印所證明，如“文帝行璽”^③、“廣陵王璽”^④、“皇后之璽”^⑤等，便是很好的例子。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印，如太守、將軍和公卿的印稱“章”（漢初仍沿秦制稱“印”），而其他官吏以及列侯、關內侯等和平民一樣，都只能稱“印”。從此，“璽”、“印”之別遂成為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一個縮影。

先秦時代，“璽”字本來寫作“尗”、“木”，後來或增“土”旁作“坵”，或增“金”旁作“鈇”。馬國權指出：“原來，璽字在古璽中多寫作‘尗’、‘木’，上端的‘丄’或‘人’，就是璽的鈕或柄的側面之形，下邊的‘凵’，是按捺之後呈現出來的紋樣。《說文解字》卷九有‘彡’字的部首，許慎解釋說：‘毛飾畫文也。’意思是用筆畫出來的綫條。可知璽字下邊的‘凵’與‘彡’實際

① 據孫星衍校集本。

② 通行本作“漢以來”，今據蔡邕《獨斷》所引更正。

③ 1983年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出土。《西漢南越王墓發掘初步報告》，《考古》1984年第3期。

④ 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山劉荊墓附近發現。《江蘇邗江甘泉二號漢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⑤ 1968年陝西咸陽出土。秦波：《西漢皇后玉璽和甘露二年銅方爐的發現》，《文物》1973年第5期。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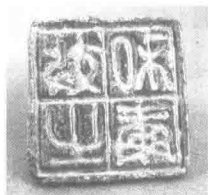


圖 2

是一路東西。我們知道，象形字的產生是先于象形兼會意字的。有了‘木’之後，才有‘杗’、‘杗’、‘杗’、‘杗’、‘杗’等形作。意思非常明顯：‘杗’，是把‘璽’這東西印在泥土上；‘杗’、‘杗’則說明璽的使用與泥土的關係；而‘杗’或‘杗’是說明璽本身的金屬質料。”^①馬說似可作為參考。

2010年，陝西省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咸陽市渭城區西耳村發掘戰國秦墓，于M81出土一方銅私印，印文為“效之私爾（璽）”（圖1），其“璽”字已寫成“爾”，便是由璽的本字“尗”、“木”字演變成“尔”字再演變為“爾”字的很好證明^②。

璽字寫成加“玉”旁的“璽”，大約始于漢代。《晉書·輿服志》說：“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據《漢舊儀》記載，“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鈕”，漢承秦制，可見秦皇帝的六璽專用玉製作。以玉為六璽後，才會出現从“玉”旁之“璽”字。不過，從傳世的秦“皇帝信璽”封泥^③（圖2），及1983年廣州象崗山南

① 馬國權：《古璽文字初探》，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論文（油印本）。

② 銅印資料及照片承劉衛鵬先生提供。

③ 陳介祺舊藏，著錄于《封泥考略》卷一，該書目錄題為“漢帝信璽封泥”。沙孟海先生指出應為秦帝印封泥，見《沙孟海論書叢稿·談秦印》，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年版。



圖 3



圖 4



圖 5



圖 6



圖 7

越王墓出土的漢初“文帝行璽”金印^①(圖3)、1968年陝西咸陽渭河北塬發現的西漢“皇后之璽”玉印^②(圖4)和傳世的西漢“淮陽王璽”玉印(圖5)來看,當時的璽字還从“土”旁。雖然在1954年陝西陽平關出土的東漢初“朔寧王太后璽”金印^③(圖6)上,印文璽字已从“玉”旁,但是在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山劉荆墓附近發現的東漢初“廣陵王璽”金印^④(圖7),璽字仍寫作“土”旁。據《後漢書·隗囂傳》,建武七年(31)公孫述以隗囂為朔寧王;同書《光武十王列傳》記載,永平元年(58)劉荆被徙封為廣陵王,永平十年(67)因謀反事敗被迫自殺,可見廣陵王璽的鑄造年代略晚于朔寧王太后璽。因此,確切地說,璽字寫作从

① 《西漢南越王墓發掘初步報告》,《考古》1984年第3期。文帝即趙昧,于公元前137年自稱“文帝”。

② 《西漢皇后玉璽和甘露二年銅方爐的發現》,《文物》1973年第5期。有學者認為是漢初呂雉之印。

③ 《陝西陽平關修築寶成鐵路中發現的“朔寧王太后”金印》,《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3期。

④ 《江蘇邗江甘泉二號漢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玉”旁的“璽”，應該是東漢初年的事。另外，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一書中，璽字的本篆也還是從“土”，祇是籀文從“玉”，也可作為旁證。

古璽起源于何時，歷來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傳世文獻記載璽印的起源甚早。《後漢書·祭祀志下》說：“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漢代的緯書《春秋合誠圖》也說：“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匣，長三尺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春秋斗運樞》則說：“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章，文曰‘天王符璽’。”說黃帝或三王時代已出現璽印，自然令人難以相信，然而透過此種神話傳說，認為中國的璽印起源可能很早，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璽印的產生與其他器物一樣，有一個技術前提。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璽印的發明與印紋陶有關，類似印的器物最早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當時陶器上的紋飾，其製作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拍打，另一種是壓印。壓印的花紋，是用土燒成的陶印模或用石雕的石印模（上面均雕出花紋）戳打在陶器坯上顯示出來的。雕花紋的印模再進一步發展，便是雕字印模，即成為後來印章的先河^①。這種陶、石質的印模在中國南方時有發現，例如在福建長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一次就發現陶印 18 個。據林惠祥的調查報告說：“陶印 18 個，都是方形扁塊如小磚狀，殘缺各一半。花紋有一面的，也有二面以上的，都曾經燒過。上面的花紋和陶片的紋飾相同。”^②類似的陶印，在雲南元謀大墩子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出過幾件，面飾方格紋；雲南賓川白羊村也出土過一件，器形不規則，面飾斜方格紋，與同地所出的陶器紋飾相同。另外，大溪文化的陶器紋飾的主要特點是戳印紋，器表紋飾係用圓形、半

① 那志良：《鈔印通釋》，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版，第6頁。

② 轉引自那志良：《鈔印通釋》，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版，第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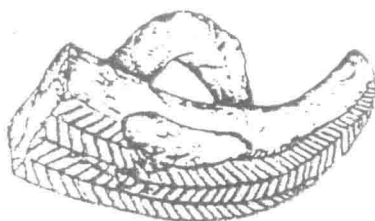


圖 8

圓、新月、三角、長方及“工”字形等各種陶、石質小印深深地抑印而成^①。近年的發現中，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永城造律臺和江蘇徐州高皇廟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帶有鼻鈕的陶印模（圖 8），從其形制看與後來的璽印形制和使用方式很相似。它與一般用于拍打陶器紋樣的陶拍在形制和用法上尚有微小的不同，但這微小的不同却使它有可能直接演進為後來具有示信功能的印章^②。

儘管上述陶、石質小印（模）解決了璽印的技術前提，可以看成是璽印的前身，但它終究不是後來表示信用意義的器物。所以，我們還不能說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產生璽印了。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外籍學者曾利用比較學的研究方法，認為中國古代璽印源于蘇美爾人的陶圓印章。早在公元前 3500—前 3100 年之間，古蘇美爾時期的巴比倫地區就已經出現了文字和標誌所有權的陶製圓筒形印章。這種陶印採用兩河流域所特有的浮雕形式，其紋飾圖案多是交織對稱的動物或神獸，其形制呈圓筒狀，可以在潮濕的陶版上滾壓出一條條連續不斷的圖案。就產生的時代而言，蘇美爾文化的陶製圓筒印章確實比考古發掘所證明的中國古璽的時代要早。但就形制、內涵來看，兩者並非同源之物。首先，中國古璽從一開始出現就是戳打式的，並不作圓筒形的直接滾壓。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蘇

① 參見王廷洽：《中國印章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 頁。

② 孫慰祖：《古陶瓷印述略》，《孫慰祖論印文稿》，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 年版。



圖 9



圖 10



圖 11

美爾文化的陶製圓筒印章著重于雕刻，所表現的主要是蘇美爾神話內容，其功能並不在於標誌身份和作為信物，而是重在表現某種觀點和思想。這和中國古代璽印的功能有著本質的不同。因此，與其說蘇美爾人的陶製圓筒印章和中國的古璽有淵源關係，還不如說它和中國漢代流行的畫像磚及古璽中的圖像印有某些相似之處來得妥貼^①。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璽印是以銅質為主，因此璽印的產生和燦爛的華夏青銅文化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繫。從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並結合出土實物看，中國的青銅時代有可能是璽印產生的時代。

《逸周書·殷祝篇》記載：“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座。”《逸周書》的內容雖已見於《漢書·律曆志》^②，有些記載也被近年考古發現的古文字材料所證實，但它是晉代才發現的古書，其內容已經過後人的整理。這段話也不似商代人的口氣，而且又無出土文物佐證，僅憑此說夏商之際已有璽印，尚不無疑問。

1940年，于省吾在《雙劍謠古器物圖錄》一書中刊布了三

① 陳松長：《璽印鑒賞》，瀋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② 《漢書·律曆志》所載劉歆《世經》引有《武成》，前人曾指出，《武成》與今傳本《逸周書·世俘》實係同篇。參見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又，最近公布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有《逸周書》的《皇門》等篇內容，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版。